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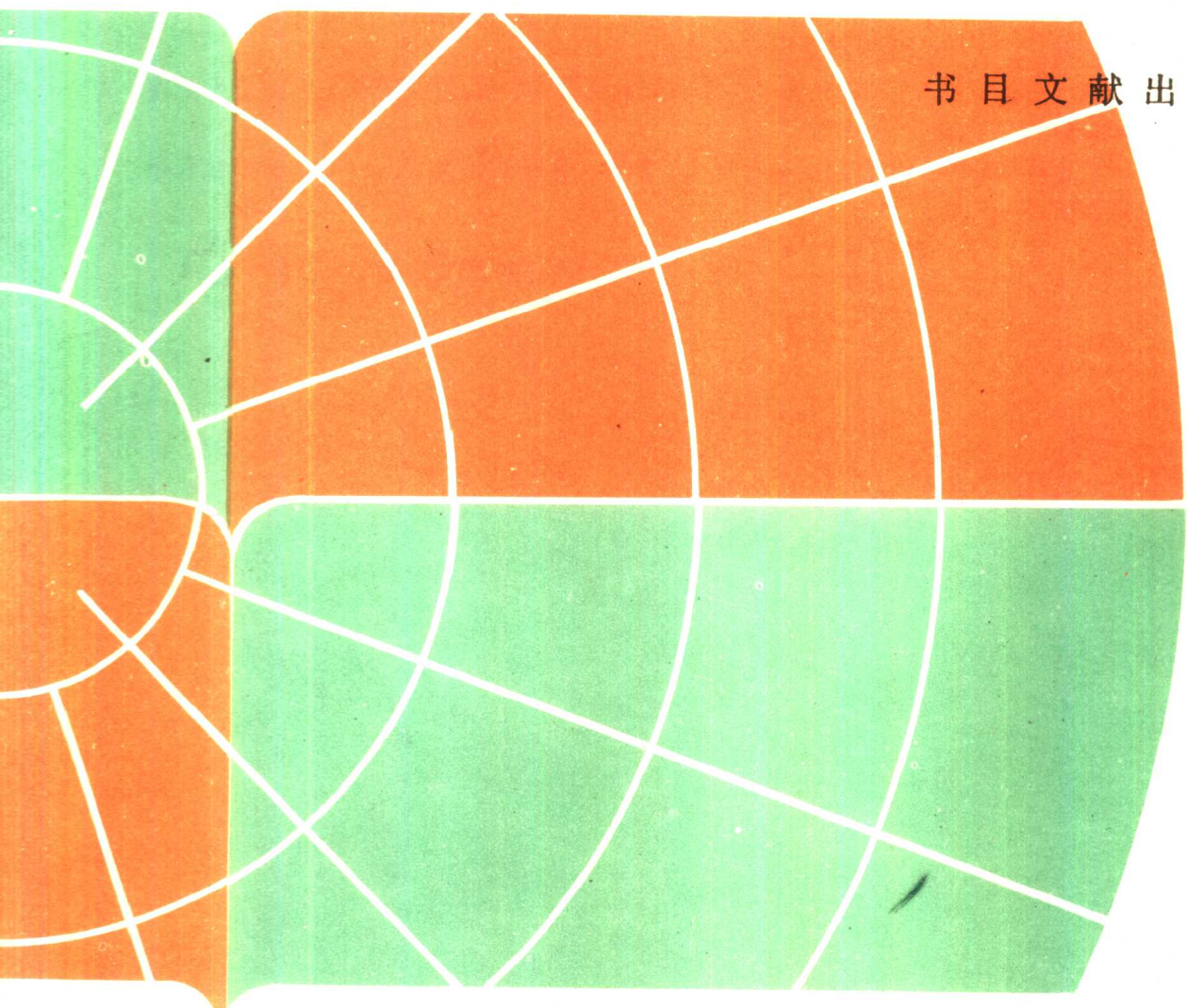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世界史研究

105-13

第2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世界史研究

第二辑



出版社

编 后 记

本专辑中《西洋古代史史料概论》、《古罗马文献中的中国》是两部资料比较丰富的论著，可供古代史研究工作者参考。《二十世纪初期的俄罗斯》是一篇译文，作者从同我们截然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俄国历史研究的看法，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航海史在世界史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大航海时代：从地中海到大西洋》，以中世纪的航海活动，把当时欧洲各国的历史及发展串连了起来，值得一读。

世 界 史 研 究 (2)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剪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六号)

河北省南宫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6印张 154千字

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 11201·27 定价: 1.55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研究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某些出于反动政治宣传目的，蓄意捏造、歪曲或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予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慎勿丢失。

目 次

总 论

西洋古代史史料概论

邢义田译 一

略谈美国的华人史研究

郑德华·成露西 1

古罗马史

古罗马帝权的真象(二)

一三

罗马帝国西部沦亡的原因: 蛮族的侵迫

涂永清译 二一

古罗马文献中的“中国”——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所录罗马记载“中国”译文订补

邢义田 二七

中世纪史

大航海时代: 从地中海到大西洋

关得雄 三九

俄国近代史

二十世纪初期的俄罗斯(上、下)

伏·别雅耶夫 五六

朝鲜近代史

日韩江华岛事件的检讨(上)

林子候 六二

韩末抗日义兵与韩、日政府的对应策(上)

李求熔 七八

西洋古代史史料概論 (二)

H. Bengtson 原著
邢義田 譯

原始文獻固然為古史裏個別的人和事，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不過，如果不是古代的史家曾留下他們對古代世界（從波希戰爭至古典時代之末）延續不斷的觀察，整個古代歷史終將混沌不明。因為希臘多德，我們才有希臘與波斯殊死鬥爭的珍貴紀錄；由於修西底地斯及其後繼者，我們才知波羅奔尼撒戰爭的歷史。

關於羅馬的元首制（Principate），塔西特（Tacitus）、笛歐（Cassius Dio）的史書以及蘇東尼烏斯（Suetonius）的傳記中都有可貴的記載。這些記載雖不比碑銘和草紙文書更有價值（後者在近代的歷史研究裏所佔的份量，事實上愈來愈大），但是，大體而言，古代史家的作品仍然是當今所有研究的基礎。在許多方面，甚至除此即無其它資料可循。因此，研究古代史學仍然必為古史訓練的重心。

由於近代的古史學者，對古代史學著作依賴必須如此之深，他們不得不注意一些相關的特殊問題。這正如謝瓦茲（Eduard Schwartz）所強調^{③⑧}：每個學歷史的人都受其思想之驅使，學術研究都和個人的欲望與價值觀念相連。這種思想與情緒因素奇妙的結合使每一件史學著作都是一家之言。

簡言之，史學著作不僅僅是史料的一部分，而是曾被賦與藝術形式的一部分。任何人想要將過去當作一有機的整體，加以描述，不論以時間或事件為綱領，皆依循一傳統而為。這個傳統可以從現在，歷中古、拜占庭的史家，追溯到西方史學的起始源頭。

史學（historiography），正如這一字彙本身所示，是希臘文化的產物。希臘人使人類第一次意識到人的重要性與獨特性。古代近東的無可名之為史學者（譯注一）。他們雖有寫史的意圖，例如西臺人的年表，希伯萊的史著，但從非為了記載過去而寫史。即使斯巴達時代的編年之作（chronicle）也沒有引發真正史學的興起。

古代蘇美人（Sumerians）、巴比倫人所記述的，和希臘人早期的史著，頗有相似之處，例如，他們對神話與歷史，人與神都混而不分。不過，西方史學的起源和古代近東的年表與編年並沒有任何真正

的關聯。

荷馬（Homer）的「伊利亞德」（Iliad）是由神話、冒險故事與史實交織而成。「伊利亞德」裏，希臘人與特洛伊人（Trojans）之間的戰爭是一段自神話世界提昇出來的歷史。然而這段歷史不可否認是有歷史事實為基礎。

希臘語，「歷史」（historia, ἱστορία）一字的意思是「探究」，「發現」（to explore, discover）。較早的希臘史學事實上，的確只是「發現」的記載。尤其是據傳聞或記錄所知，關於其它民族風土的記載。

希臘史學，亦即整個西方史學開始的第一個人物是米·希卡泰斯（Hecataeus of Miletus, c. 500B.C.）。其作以遊記與譜系（travels and genealogies）為主。此二者正包含希臘史學思想的兩個基本方面。他的「世界之旅」（Journey round the World, Περιήγησις），反映出愛奧利亞（Ionia）的大同世界，這個世界與歐洲、亞洲、利比亞（Lybia），甚至西地中海皆相毗連。他的「譜系」（Genealogia）涵攝從英雄時代到希臘殖民開始的時期，從而為「希臘初期歷史」建立了輪廓。這位先驅史家已顯示出他對歷史的延續性（continuity）有相當可觀的掌握。他在「譜系」一書起首，曾勇敢地宣告：「米·希卡泰斯說：以下是米·希卡泰斯的記載。在這兒，我記下我以為真實的事務。希臘的傳統與此相左，並且在我看來，是愚蠢的。」^{③⑨}可是他並沒有歷史批評的觀念。他天真地相信，僅僅用邏輯和常識就可以發現真理。

因此，西方真正的第一位歷史家不是米·希卡泰斯，而是希臘多德（C485—C428B.C.）。在他的作品中，民族志與真正的歷史解釋相結合。這種解釋使他對希臘與波斯人鬥爭的記錄能成其格局並統一為一體。他的解釋是在伯里克利斯時代雅典的影響下，發展出來。雅典的政治激起他研究的興趣。這時愛奧利亞的重要性自愛奧利亞革命（Ionian Revolution 500—494B.C.）以後，已日益衰退；其政治與文化的領導地位轉入雅典之手。

希臘多德所據的資料有二：一是他親自見聞，二是得之於傳統者。他雖然曾利用米·希卡泰斯的著作^{④①}，基本上，他憑藉的傳統仍

然是一個口耳相傳的傳統。波希戰爭這段英雄時代的記憶，在當時希臘人心中仍然是活生生的。希羅多德依自己的脾胃，利用這一傳統，因此，他所選取的主要是一些傳聞軼事。不可否認，他的書有不少弱點。這是他受時代知識局限的結果。然而，我們不能不佩服他掌握主題和組織素材的本領。他能認識到波希戰爭，希臘在馬拉松、撒拉米斯（Salamis）和普拉塔亞（Plataea）贏得勝利的重大意義，並且指出這些勝利為何會構成世界史上的轉捩點。他將這一場門爭看成是波斯帝國主義與希臘自由的衝突。這個觀念顯露了那個時代主宰的力量，也成為更深一層瞭解那個時代歷史發展的基礎。

和希羅多德、修西底地斯同時代的還有一群歷史家。他們通常不甚妥當地被稱之為「散文作家」（logographers，意即散文寫作作者 prose writer），諸如：米·戴歐尼修斯（Dionysius of Miletus）、里·希蘭尼喀斯（Hellenicus of Lesbos）、藍·查隆（Charon of Lampascus）。他們的史著，除了些斷簡殘篇，皆已不存。不過從這些殘篇仍可看出不少他們寫史的前提和方法。他們寫諸系、民族志，也寫地方志（例如藍·查隆和編年史（例如里·希蘭尼喀斯）。他們對希臘史雖然並不是完全沒有一個通釋，不過，從這些殘篇看來，它們不像希羅多德和修西底地斯的書一樣，有一個中心的觀點。關於地方志，我們必須一提「雅典志」（Athens, *Atthides*）。「雅典志」是由一群「雅典方志年表家」（Atthidographers）所寫的雅典歷史。由里·希蘭尼喀斯（C.500—C.415B.C.）開始撰寫，而由菲羅寇魯斯（Philochorus, C.340—263/2B.C.）煞尾。

修西底地斯（C.460—C.400B.C.）寫「波羅奔尼撒戰爭」，也就成為「專史」（historical monograph）的始創者。和希羅多德比較來說，他分析的更深入，更注意到歷史中一些深藏基本的動力。修西底地斯生當雅典與斯巴達爭霸之秋，甚至曾親歷其戰爭。他漸漸地覺察到，戰爭的各階段是一場大門爭的片斷。由於他記述了這一場希臘人的內戰，西方史學有了第一部，注意到塑造民族和國家發展基本動力的作品。他對戰爭導火線和根本原因的區分，對軍事和外交發展相互關係的描述，對歷史偶然機緣（the role of chance）的強調，對不依賴超自然的解釋，以及從邏輯的角度，記述歷史的發展，都屬新穎，並對歷史解釋的深刻化，貢獻厥偉。由於他寫這本書寫的如此完美，他的確達成了他的初衷——為後世留下一筆永恆的財產（an everlasting possession, *Κτήμα εἰς αἰῶνα*）。他的書是為那些想要知道，在歷史個別事件背後，歷史發展基本動向的人所寫。從這一角度

看，我們可以說，修西底地斯是一位將歷史從主觀研究超脫出來，並使它成為一門學術的人。

修西底地斯的「發現」，是關於戰爭史，依照冬天、夏天的時序編排而成。這時國際間的政治活動，只有在和瞭解這場戰爭的過程有關時才被提出來討論。他受時代思潮，尤其是辯師運動（Sophistic movement）的影響甚深（詳注二）。這從他書中許許多多的演說可以證明。這些演說，分析起來，並非確有其事，只是他運用的一種工具（或說一種表達的方式），藉以從不同的觀點，不同的價值，去考量一些當時的情勢。

修西底地斯之書敘述至西元前四一一年，達然而止。從他停筆處，接續寫史的有三人：色諾芬（Xenophon）、塞波普斯（Theopompus）和克拉提普斯（Cratippus）。其中色諾芬（C.430—C.354 B.C.）可以說因為運氣而浪得虛名。因為流傳存世的只有他的「希臘史」（Hellenica, *Ἑλληνικά*）。此書繼續寫到曼丁阿之戰（the battle of Mantinea 362B.C.）。這場戰爭象徵提比斯（Thebes）短暫霸權（371—362B.C.）的崩潰。在色諾芬及當時希臘人的眼中，希臘史於焉告終。色諾芬的「希臘史」文筆生動有力，頗像他的「小塞魯士遠征記」（Anabasis）。但是就一本歷史著作而言，它有嚴重的缺點。由於他偏袒斯巴達和斯巴達的價值觀念，使他無法公正對待提比斯人，甚至公正評斷自己的同胞——雅典人。

修西底地斯純熟地將形式與內容結合起來。他在這方面達成的成就，在沙祿斯特（Sallust）與塔西特斯（Tacitus）出現以前，沒有人能趕得上。修西底地斯所著以軍事和政治為核心。在這兩方面，西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史學有所不同。此時的史學與政治愈離愈遠，而這時希臘的史家面臨一困境，即希臘的城邦體制日漸衰落，馬其頓王朝因非利浦二世和亞歷山大而崛起。他們雖然吸取並擴張了希臘文化，但是他們畢竟是馬其頓人而非希臘人。他們竟找不到夠格的史家去記載他們的豐功偉業。塞波普斯（約生於 380B.C.）曾寫「非利浦史」（*Philippika*），將非利浦描寫成歐洲史上最偉大的人^①。能夠客觀公正評價這位偉大的國王和他更偉大的兒子的希臘人，連一位也沒有。

在亞歷山大統治以及其繼承者混戰的時期此一混戰長達四十年，323—281B.C.，最主要的事就是戰爭。軍事史因而興起。軍事史興起並自成一格，始於托勒密王朝的建國者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死於 238B.C.）。軍事史的特在於它平實、詳盡、句風格，而以傳統的「軍事日誌」（Military Journal, *Ἡμερησίον*）為基礎，以

史學的形式而言，軍事史代表了對愈來愈強重視辭藻的趨勢，以及對環境亞歷山大在世時即已形成的種種傳奇的反動。

亞歷山大的遠征和馬其頓之征服亞洲，為希臘的民族志開創了新天地。尼阿喀斯（Nearchus of Crete），恩西克瑞特斯（Onesicritus of Astypalaea）（兩人皆與亞歷山大同時代）和梅格塞尼斯（Megasthenes of Olynthus，他在 Seleucus I 的時代曾至印度）的作品，在形式上都和愛奧尼亞較早的遊記文學有關係。這些希臘早期的民族志作者為後來婆塞東尼斯（Poseidonius, C.130—C.50 B.C.）廣博的研究預立了基礎。婆塞東尼斯的史作曾影響到凱撒和塔西特斯；後二者又影響了古典末期的一位東哥德史家卡西多勒斯（Cassiodorus, C. A.D.480—575）以及普羅柯皮斯（Procopius）普羅柯皮斯在查士丁尼的時代，為蠻族留下了許多多姿的紀錄。

大部分希臘化（Hellenistic）時代的史學著作，包括尤門尼斯（Eumenes）的朋友卡·希羅尼姆斯（Hieronymus of Cardia）所寫有關亞歷山大繼承人的歷史，皆已失傳。這主要是因為羅馬帝國時代，第二次辯師派「雅典主義」（the "Atticism of the Second Sophistic"）風氣下（詳註三），文學品評的標準大為改變的結果。除「雅克比」（Felix Jacoby）新近在「希臘史籍輯佚」（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中蒐錄的殘篇之外，我們所能見到這時期重要的史著，只有波利比阿斯（Polybius of Megalopolis, C.200—C.120 B.C.）的殘卷而已。波利比阿斯本人是一位活躍的政治家，也是亞該聯盟（Achaean League）的一位領袖。西元前一六七年，希臘臣服於羅馬。他被送到義大利當人質。在義大利，他成為斯基皮歐（Scipio Aemilianus）結交的學者之一。他遂以記述從西元前二二〇至一六八年，羅馬興起、稱霸的經過為志職。對於這一經過，他曾親歷目睹其中的一部分。

波利比阿斯認為歷史研究是為政治生活提供教訓。因而，他成為實用派史學（pragmatic historiography）^②的鼻祖。他的史著開切的，確乎是「世界全史」（Universal History）。因為這時羅馬已因征服，將整個地中海世界化為羅馬的疆域（Orbis Romanus）。

他的書是從提達烏斯（Timaeus of Tauromenium, C.345—C.250 B.C.）傳筆處寫起。提達烏斯在西元前二六四年，曾寫一部西地中海地區，包括西西里、義大利和迦太基的通史。波利比阿斯採取了這種世界通史的路數，所不同的是他以羅馬為記述的中心。

波利比阿斯的書記述至西元前一四五、一四四年左右；接著，婆

塞東尼斯繼續寫到蘇拉（Sulla）的時代。我們知道他的書，主要是因為奧古斯都時代的蒂歐德斯（Diodorus）曾摘引其作。後者寫有一部世界史。這部世界史，事實上，是「編纂」而非「著述」。

希臘化時代的世界全史表現出一種新的對世界史的態度。這從亞歷山大時代塞·艾弗勒斯（Ephorus of Cyme）所寫的「史記」（Histories）已多少可見其端倪。羅馬在軍事和外交上的成功意味著希臘化時代邦國體制（Hellenistic state system）的結束，而希臘化時代的文化亦逐漸由羅馬的文化和精神所取代。不過，羅馬文化的本身實深拜希臘之賜。羅馬的史學也不例外。

羅馬人有心將他們的法律加諸於全世界。對他們而言，史學也不是一門學術，而只是他們政策的延伸和一種政策的武器。因此羅馬較早的歷史家，諸如皮克托（Q. Fabius Pictor），阿里敏德斯（L. Cincius Alimentus）和卡圖（M. Porcius Cato），都是政壇上活躍的人物。這種現象實非偶然。皮克托的「史記」（Histories）約寫於西元前兩百年。他和稍後同時代的阿里敏德斯（曾於西元前一〇一年任 praetor）都用希臘文著書；在體例上，也都以編年方式為基礎。作為羅馬史學開端的官方大事記就是用按年排比的方式。這種體例一直沿用到共和結束。奧古斯都時代的李維（Livy）以及塔西特斯所寫的最後一部著作——「帝王本紀」（Ab excessu divi Augusti libri）或他所自稱的「年代記」（Annales），也都仍舊採用編年體。

皮可托在形式上雖然追隨羅馬的年代記，其作卻是泛希臘主義（Cosmopolitan Hellenism）的真正產物。他的作品就像埃及的瑪尼索（Manetho of Sebennytus, C.300—250 B.C.）和巴比倫的祭司貝羅羅斯（Bel Berosus, C.280 B.C.）所作，都是以希臘文寫成。皮可托的作品證明了希臘化文化的鉅大影響力；即如羅馬人亦無力抗拒。以拉丁文寫成的第一部史著是卡圖（234—193 B.C.）的「羅馬源始」（Origines）。這也是拉丁文學散文寫作的開始。然而，這種寫作也是在希臘化傳統下成形的，甚至書名「源始」，即相當於希臘化的「開創故事」（foundation stories）。卡圖在形式上打破編年體，在內容上，作為一個拉丁人，他不僅注意羅馬，也注意到義大利的各個地方。他這種態度迥然不同於以羅馬為中心者。不過，以羅馬為中心的觀念，如塔西特斯作品所顯示的，事實上一直沒有能夠真正打破。羅馬史學的一大特色始終是以「羅馬為世界之首」（Roma caput mundi）。

除了編年體，專史(historical monograph)也在共和末期的一百年中出現。專史始於安提派特(L. Coelius Antipator)的「迦太基戰爭史」(Bellum Punicum)。此書記述從大約西元前一二一年以後的第二次迦太基戰爭。專史的最佳代表作是沙祿斯特的「卡提蘭的陰謀」(Coniuratio Catilinae)、「鳩古善戰爭史」(Bellum Iugurthinum)，尤其是他的「史記」(Historiae)。沙祿斯特曾受希臘化時代史家兼博學之士——婆塞東尼理論的影響。沙祿斯特生動刻劃出羅馬共和的衰落。刻劃的畫面雖然色彩慘黯，卻仍不乏令人驕傲與欣慕之處。這位天才畫家的作品反映了一種對痛苦逆來順受的心情。他利用從修西底地斯學來的技巧，增強了其作品的衝擊力。

沙祿斯特的作品和衰落中的羅馬共和，息息相關，而李維的史著則表現出羅馬傳統在奧古斯都時代的恢復。從研究方法上看，李維和沙祿斯特或塔西特斯一樣，不像一位近代的學者，因為他也從不參考檔案文獻。他的大部頭「羅馬史」，轟動一時，不過僅僅是一位受過修辭訓練的文人，將現成的材料，隨手編纂出來的東西而已。他寫羅馬早期的歷史，是根據一些編年史舊作；第二十卷以後，借用波利比阿斯之作的地方愈來愈多。這部大書(有一百四十二卷之多！)後來成為「標準的」羅馬史。其不小的一個原因是，此書風格優美，作者對羅馬獨特的傳統，懷有一份熱愛。在李維以後的幾百年裏，他的書一直被認為是無法超越的模範。在近代史家路易士(Louis de Beaufort)出版「羅馬前五百年史質疑」(Dissertation sur l'incertitude de cinq premiers siècles de l'histoire romaine, Utrecht, 1738)以前，從沒有人懷疑李維使用的材料是否可靠。

李維生處奧古斯都的時代，並處於歷史轉捩的時期。因為這時的新紀元的開始。這段時期的特色是兩種語文(拉丁與希臘文)並用，以及君主制與共和制傳統間的衝突。奧古斯都時代整個來說，並不有利於史學研究。因為在王朝的陰影下，真正的歷史研究是無法繁榮滋長的。這一點可以從希臘化時代的情形得到證明。在當時的王國之中，從不曾產生過一位著名的史家(波利比阿斯來自亞該亞同盟的地區，婆塞東尼是在羅德島 Rhodes 渡過他心智成長的歲月)。

和李維同時的，有一位希臘修辭學家哈戴歐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他的「羅馬稽古錄」(Roman Archaeology)

出版於西元前七年，敘述西元前二六四年以前的羅馬歷史。全書共二十卷，唯前十卷、第十一卷的大部分以及其它的一些片斷存世。就一部史著而言，他的書令人失望，因為他用了許多不可信的編年史料。

在奧古斯都時代曾出現兩位世界通史的史家。這意味當時的人已覺察到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其中一位是羅馬化的塞耳特人(Celts)——龐派烏斯(Pompeius Trogus)。不過，其作以希臘史為中心。另一位是希臘化的敘利亞人，猶太希律王(King Herod)的朋友——尼古拉斯(Nicholas of Damascus)。尼古拉斯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多達一百四十四卷，從太初一直寫到西元前四年，希律王死為止。這部書只有殘卷存世。其中除了作者當代的記載，其餘皆有所淵源，不可視為獨家的史料。我們讀記載作者當代的部份，也必須十分謹慎，因為從他其它的作品(包括一部奧古斯都傳)觀察，他所寫的，有時並不可靠。

大體而言，元首統治時代的史學以對王朝統治原則的強調，以撰寫傳記，尤其和羅馬皇帝個人有關的傳記為主，為特色。可為此風氣作證的是一位羅馬官員維來烏斯(Velleius Paterculus)在西元三十年出版的「羅馬史」(Historia Romana)。書中所述全是奧古斯都和當時皇帝提比留斯(Tiberius)的事情。而修辭學家柯丟斯(A. Curtius Rufus)的「亞歷山大大帝史」(Historiae Alexandri Magni)正顯現亞歷山大神話在帝國初期的再度流行。

羅馬史學最重要的成就是塔西特斯(Cornelius Tacitus, A.D. 55—C.120)的作品。這位史家可以說是羅馬傳統貴族價值最純粹的化身。他所寫的「史記」(Historiae, 一部當代史)，從西元六十九年寫到西元九十六年多米提安皇帝(Domitian)死為止。這部書只有頭兩年的部分流傳下來。他的「年代記」(Annales, 正式名稱為「帝王本紀」Ab excessu divi Augusti libri, 從奧古斯都死至奧利安克勞迪安王朝-Julio-Claudian dynasty 結束)，也只有部分傳世。傳世部分為卷一至卷五，卷六、十一的末尾，卷十六的部分卷尾。西元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間的記載，大部失傳。西元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六至六十八年間事則悉數無存。我們要欣賞他的作品，必要先有一認識，即塔西特斯是一位從未全然接受元首統治的現實的人。他的作品即反映這樣的政治信念。他雖然讚揚皇帝崔堅(Trajan)是「最

好的元首」(Optimus princeps)：此外，在皇帝卡巴(Galba)領養皮索(Piso)的演說中(Hist. 1.15—16)，顯示他贊同王朝下的養子制度，不過，他仍然醉心於已失去的「自由」(libertas)(譯註五)。這種自由只能在「共和制度」(res publica)而不能在「元首制度」(principatus)下滋長。塔西特斯所依憑的權威史料，固然已經對各個皇帝和他們的統治作了完全的一套解釋，他將這些解釋發揮的更全面和澈底，並且合為一幅精美的錦繡圖畫。他成就的偉大，在於他深思，重心理描寫的風格，以及他筆下無比感人的力量(這些有時當然也會損及歷史的真實)。悲觀主義構成塔西特斯的世觀。即因如此，他無法對羅馬帝國及其價值作公正的評斷。

李維之作取代了先前編年史家的舊作；同樣的，塔西特斯也取代了帝國時代的前輩史家。因此，除了書名之外，我們對奧非丟斯(Aufidius Bassus)、蒲林尼(Pliny the Elder)、克路維斯(Cluvius Rufus)和法比烏斯(Fabius Rusticus)著作內容幾無所知。只有少數能逃過塔西特斯的競爭，例如，以希臘人寫史的約瑟夫(Flavius Josephus, C. A.D. 37—100)。約瑟夫寫自己民族，也是羅馬頑強死敵猶太人的歷史——「猶太古代史」(Jewish Antiquities)，從最早一直寫到西元六十六年猶太人大叛亂為止。他另一部較早的作品——「猶太戰爭史」(The Jewish War)則記載尼洛(Nero)和韋斯巴息安(Vespasian)兩皇帝時，猶太的動亂。在令人敢怒不敢言的奈米遜皇帝時代(A.D. 81—96)，塔西特斯不吝一語，叛逆的約瑟夫卻在西元九十二年出版了他的「猶太古代史」，並獻給皇帝的一位「解放奴」(freedman)(譯註六)。

西元二世紀時，希臘文化重新興起。興起的證據可從歷史著作見之。尤其是畢熱尼亞(Bithynia)總督阿利安(Arrian of Nicomedia, C.A.D. 95—175)所寫的「亞歷山大遠征記」(Anabasis of Alexander)和印度「Indica」以及「阿皮安」(Appian of Alexandria，約生於160B.C.)所寫的「羅馬史」(Roman History)皆可為證。阿皮安的「羅馬史」尤富想像。它是依照羅馬戰爭發生的地點，加以編排敘述。

然而，能將希臘人在史學上高人一等之處，表現的最清楚的，無過於笛歐(Cassius Dio Cocceianus, c.A.D. 155—235)的「羅馬史」(Roman History)。笛歐是畢熱尼亞人。他以李維，而不以塔西特斯為典範。他的八十卷書，從羅馬源始寫到西元二二九年為止。其中關於他身處時代的部分，甚有史料價值。笛歐對拜占庭時代的人而

言，是新舊羅馬的連鎖，他因而對文化史有所貢獻。他扮演的歷史角色可與希臘化時代的波利比阿斯相比擬。

另外一位希臘史家是笛歐同時而稍晚的希羅丁(Herodian)。希羅丁是希臘化的敘利亞人，其成就非笛歐之比。他的羅馬帝國史有八卷，起自奧尼留斯(Marcus Aurelius A.D. 161—180)皇帝之死寫到西元二三八八年。書中沒有任何特殊的觀點。不過由於沒有其它關於這段時期的史籍存世，他的書就不無重要性了。

傳記和編年之作到西元四世紀初，以尤西布斯(Eusebius of Caesarea)之作達於極致。除此之外，一種新的歷史著作——教會史(church history)出現於康士坦丁大帝使基督教和其它宗教立於同等地位之後。教會史濫觴於尤西布斯的「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這書有十卷，寫到西元三二四年止。尤西布斯不顧傳統史學成例，將許多原始文件，甚至全文完整的納入書中。如此，他為後世保留了很多有價值的原始資料。他的書成為「全教會」(Universal Church)辯護的經典著作。教會於備受迫害之後，終獲勝利。其後有許許多多人模仿他寫教會史。

其它的教會史有西元三一八年出版，拉克坦修斯(Lactantius)的「殉道錄」(De mortibus persecutorum)，西元四一七年稍後出版，一位西班牙長老歐羅休斯(Paulus Orosius)所寫的世界史，叫「駁異端」(Adversus Paganos)。歐羅休斯是應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建議而寫。其書對李維之作依賴甚重。

聖·奧古斯丁(A.D. 354—430)因在晚年寫了一部哲學史——「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而造成極大，甚至可以說是劃時代的影響。這書寫於西元四一〇年阿拉瑞克(Alaric)攻陷羅馬，引起大恐慌之後。這部書使基督教建立了上帝之城與俗世之城，兩個世界並存的觀念。這個觀念一直延續到歐洲中古時期。

阿米亞魯士(Ammianus Marcellinus, c.A.D. 332—400)是敘利亞安提亞克(Antioch)地方的一個非基督徒。他在四世紀末寫下一部非教會觀點的歷史。他的書可以說是拉丁史學的一部傑作，也是古典文化墮下最後一部重要的史籍。自他以後，古典史學即趨式微。阿米亞魯士是希臘人，卻以拉丁文著史。這反映出時代的複雜性。他有意繼續塔西特斯的著作。可惜其書前半已佚，我們只能看到記載西元三五三年至三七八年(卷十四至卅一)，動盪不安的一段。阿米亞魯士在這二十幾年裏，曾親身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他書中的中心人物是羅馬史上最後一位非基督教皇帝朱利安(Julian)。阿米

亞魯士對他評價甚高。

在五世紀和六世紀初，沒有一部希臘史家的作品可以和阿米亞魯士的相比。一直到查士丁尼（Justinian, A.D. 527—565）皇帝時，才有一位天才史家普羅柯皮斯（Procopius of Caesarea）出現。普羅柯皮斯的「史記」（History）有八卷，模仿阿皮安之例，依照戰爭發生的地點編排。他寫的是查士丁尼時代的戰爭。後來他又寫了一部「秘史」（Secret History），表現他對暴君查士丁尼的不滿。他敢如此，是因為寫書時，查士丁尼已死。

古典時代的史學至普羅柯皮斯而告終。當世界編年形式的歷史著作成為主流，六世紀時，寫「世界編年史」（World Chronicles）的敘利亞安提亞克史家——麻拉拉斯（John Malalas）以及七世紀時，同一地方的安提亞克魯斯（John Antiochenus）將史學引進了中古時代。

大體而言，古代的史學有一共同特徵，即不論是希羅多德、修西底德斯或西元前四世紀的史家，或色諾芬、塞波普斯、艾弗勒斯、波利比阿斯、李維，他們所寫的都是當代史；即使寫世界通史，也以大部分的篇幅寫自己身處的時代，而且寫的遠為詳盡。希羅多德以三分之一篇幅記述西元前四八〇至四七九年間，色奇斯王（Xerxes）對希臘的入侵；艾弗勒斯以希臘文寫的通史始於多利安人（Dorian）入侵，但他以三十卷中的十卷記錄最後五十年，亦即西元前三八七、三八六年至三四〇年間的事。羅馬的編年史家，甚至李維也都是如此。因此，古典史學大體是以廣義的當代史為主。門塞耳（F. Münzer）曾謂：「人們並不研究過去以求發現歷史確實如何發生，而毋寧是想瞭解當代的事務是如何形成的。」

傳記在理論和實際上，都和古代的史學有截然的差異（詳註六）。歷史注意「事功」（*praxeis, res gestae*）和「行為」（*deeds*）；傳記則在表現性格（*ethos*）以及傳主形貌與精神上的特質：他們像英雄，或像某種典型。古代傳記的起源，一部分植根於「人物描寫」（*literary portrait*）的發展，一部分在於心理的研究。前者，例如色諾芬筆下的「斯巴達王」阿格西拉斯（Agessilaus）和艾索克利蒂斯（Isocrates）描寫的「沙拉米斯薩拉米斯王」伊瓦葛拉斯（Evagoras）；後者，尤以亞里斯多德的逍遙學派（*Peripatetic School*）的貢獻為大，例如塞弗納斯特斯（Theophrastus）的「論性格」（*Characters*）

傳記之學至希臘化時代中葉而充分發展。不過，現存這類作品最

早的是與西塞羅同時，李伯斯（Cornelius Nepos）所寫的「名人傳」（*De viris illustribus*）。這部精短的傳記很顯然是本於希臘化時代的另一部名人傳記。古代傳記至蒲魯塔克（Plutarch of Chaeronea, c. A.D. 45—c. 125）而登峰造極。在他的「對比傳記」（*Parallel Biographies, Bioi parallēloi*）中，他將羅馬人與希臘人，安排成一對一對，加以比較。一般而言，他的比較失於浮淺，並強調將每一對人物作結論性的比較（*synkrisis*）。該書共有廿三篇雙傳及四篇單人傳。博學多識的蒲魯塔克曾蒐集了極多的資料，有許多甚至是第一流的史料。他在「亞歷山大傳」的引論中曾說，他覺得對他而言，傳說遠聞反而比事實更重要，不論這些事實在世界史上多麼重要。他對真正人物傳的強調，說明了他為何什麼對歷史的底層力量漠不關心，事實上，他僅偶爾觸及這一層而已。

以上對蒲魯塔克「對比傳記」的批評也適用於蘇東尼烏斯（C. Suetonius Tranquillus, c. A.D. 75—c. 160）所寫的羅馬皇帝傳。蘇東尼烏斯是哈德良皇帝（Hadrian）的書記（*ab epistulis*）。他是第一個想要在王朝史的傳統中，記述羅馬皇帝生平（從凱撒到多米提安）的史家。可是，他傳留在一個膚淺的層面，將有價值的史料與瑣碎的宮闈流言混為一談，結果令人覺得其書混雜不明。不論如何，他的皇帝傳卻樹立了一個新的傳統。在塞維爾王朝（the Severi, A.D. 193—235）時代，馬瑞烏斯（Marius Maximus）曾加仿效。其作雖已佚失，但我們仍可從後來史家的摘引，略知一二。其書與另一部「羅馬皇帝史述」（*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實相銜接。「羅馬皇帝史述」據稱是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康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時代的六位史家所寫：事實上，是奧利安或塞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時某個作家所偽作。這部書的反基督教色彩以及對奧利安皇帝的理想化（這一點隱藏在對一位實際不值一提，來自敘利亞的皇帝 Severus Alexander 的頌揚中），都暴露這是一部西元三三〇至四百年間，異端反教的宣傳品。這本皇帝傳涵蓋的時代，從哈德良到卡洛斯（Carus）及其諸子（A.D. 117—285）。書中還有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猶待語言學家、歷史家、錢幣紋章專家、宗教史家以及其他學者去尋找答案。學者將這本書看成是「大眾讀物」（*popular work*），而不是一本有歷史思想的作品，無論如何是不錯的。布克哈特在討論這本書的作者時，曾如此總結：「這些作者是一群傻瓜，但還有趣。」在大約西元三六〇年，當威克特（Sextus Aurelius Victor）寫「羅馬皇帝傳」（*Caesares*）時，他隨當時的喜好，刪削內容，使篇

幅不過為一節略本。此外，從他所寫的聖徒傳記，我們可以發現他和中古傳記文學之間的連鎖。其中，尤奇布斯（Eugippus）所寫的聖·塞維瑞魯斯（Life of St. Severinus，約成於西元五一一年）是一個重要的例子。此傳對西元四五〇至五百年間，多腦河沿岸各省的情形有多姿多采的描述。

在恩郝德（Einhard）的「凱羅魯斯傳」（Vita Caroli Magni）中，古典精神曾以蘇東尼烏斯塑造的形式，再度復活。此後，蘇東尼烏斯就成為帝王傳記的典型祖師。

以上概括地談來，最多是將古典時代史學的主流始末作了一次回顧。一些獨特、細節之處都已略而不顧。如果想要更進一步，事實上就勢必作史家的個別研究了。如果我們有意掌握古代史家的精髓，我們就必須得從通盤發展趨勢的大結構中去了解個別的史家，並且必得去斷定他們的企圖以及成功了多少。如果要了解，例如，修西底地斯或沙祿斯特，就必須知道他們的生平著作，以及認識到他們生平與著作間的內在關聯。然而，更要緊的是，我們必須設法了解古代史家所依循研究歷史的原則為何。

最後，除非利用有學術價值的註解考釋，否則任何對古代史家的研究都不會有成果，因此，以下的書目就十分重要了（譯註七）。

民國七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改稿

原註及參考書目中書籍與期刊名稱縮寫對照表

AJP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CAH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DLZ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FGrH	Jacoby, 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JH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MH	Museum Helveticum
NJA	Neue Jahrbücher
RE	A. Pauly and G. Wissowa, eds,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RhM	Rheinisches Museum
SAWw	Sitzungsberichte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
SBAW	Sitzungsbericht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Hist. Klasse

SHAW	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Hist. Klasse
SO	Symbolae Osloenses
TAPA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WG	Die Welt als Geschichte
ZA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原註

- ③⑤ "Vergangene Gegenwartigkeiten"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I, 47.
- ③⑥ FGrH I, 1.
- ③⑦ H. Diehl, *Hermes*, 2(1887), 411ff.
- ③⑧ FGrH II, 27
- ③⑨ 古希臘文 *πατριάρχης*, 「有關政治家般的行動」：參看 M. Gelzer, *Festschrift für C. Weickert* (Berlin 1955), 87ff.

譯註

- ①關於古代近東是否有史學，學者間有不同的意見，可參 R.C. Denton ed., *The Idea of Histor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Yale U.P., 1955)。
- J.J. Finkelstein, "Mesopotamian Historiograph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Society*, 107:6 (1963), pp. 461—472.
- Sir H.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History* (London, 1981)。
- ②關於辯師運動以及修西底地斯與辯師運動的關係，可參 W.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 I. (Oxford U.P., 1939, 1974) pp. 286—331, 382—414.
- A. Lesky, *A 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 (Thomas Y. Crowell Co., N.Y., 1966), pp. 340—359, 455—482.
- ③關於第二次辯師運動，參前註 A. Lesky 書及 Moses Hadas, *A 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 (Columbia U.P., 1950), pp. 275—286.
- ④奧古斯都不稱「王」(rex)而稱「元首」(princeps)，以統治羅馬，他所建立起來的政治體制以「共和傳統」為外衣，而以君王獨裁為實質，稱之為 principate。

⑤所謂「自由」是指羅馬共和時期，羅馬公民在驅逐國王，建立共和以後，公民參與城邦事務的自主狀態與權力。這種公民參與城邦事務的自主狀態與權力隨共和末期的動亂與奧古斯都獨裁控制的出現而逐漸淪喪。有關研究可參·Ch. Wirszubski, *Libertas as a Political Idea at Rome During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Principate* (Cambridge, 1950)。

⑥解放奴 (*libertus*) 是指被解放的奴隸，獲得自由身份的人，但他們仍與原主人有隸屬關係。羅馬皇帝常將國家行政文託在屬於自己的解放奴手中。

⑦關於西洋古代史的史料，現在有一本新的英文著作可以參考·Michael Crawford ed., *Sources for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U.P., 1983)。

參考書目

通論：目前還沒有一本合適的對古代史學概論性的書籍。A. Schaefer 與 B. Nissen 合著之 *Abriß der Quellenkunde der griechischen und römischen Geschichte I* (ed. 4, 1889) II (1881) 是一本有價值的簡介。C. Wachsmuth, *Einleitung in das Studium der Alten Geschichte* (Leipzig 1895) 一書有關歷史家的章節亦有助於希臘文獻入門導論。看 Schmid 和 Stählin 之 *大羅馬史* 第四冊看 Schanz 和 Hosius 之 *大羅馬史* Müller (前編) 之 *古典研究手冊 Handbuch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Griech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2 vols., Heidelberg, 1926—1934) 不可錯。可惜不全。P. Hinneberg 所編之 *Kultur der Gegenwart I*, 8 (ed. 3, 1912) 中也有不少有價值的概論。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 之 *希臘文獻*，F. Leo 之 *羅馬文獻*。Leo 還出版了一本 *Geschichte der römischen Literatur* (Berlin 1913)，可惜全書未完。初入門的學生將會發現在 Gercke-Norden I, 3—4 (ed. 3, 1923—1924) 中 E. Bethe 和 M. Pohlenz 所寫希臘文獻大綱，以及 E. Norden 所寫羅馬文獻大綱特別有幫助。Norden 之文後由 E. Koesteremann (1933) 改。H. Fuchs (1952) 補充更多的書目。H. Fuchs 之 *大羅馬史研究* 的綜覽中曾提到羅馬史研究在某些方面的大進展 MH 4 (1947), 147—198。此外還可參看·A. Lesky, *A 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 J. Willis 與 C. de Heer 共譯 (London & N.Y. 1966); G. De Sanctis, *Studi di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greca* (Florence 1951); F. Jacoby,

Abhandlungen zur griechi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Leiden 1956); M. Laistner, *The Greater Roman Historians* (Berkeley & Los Angeles 1947); *Histoire et historiens dans l'antiquité*; Fondation Hardt Entretiens 4 (Vandoeuvres-Geneva 1958) 中有關 Herodotus, Thucydides, Tacitus 等之論文。

E. Meyer 之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中對古代史學有較簡單的綜論。此外可看 K. Beloch, *Griechische Geschichte*, G. De Sanctis, *Storia dei Romani*; 及 Müller 之 *古典研究手冊* 之各卷。H. Bengtson, *Griechische Geschichte* (ed. 3, 1965) 及 B. Niese 與 E. Hohl 合著之 *Grundriss der römischen Geschichte* (1923) 關於羅馬帝國方面可看 E. Kornemann 與 Gercke-Norden III, 2 (ed 2, 1933) 149ff 中之綜論。

殘本輯錄：一個認真的研究古代史學的學生將會參考那些佚書尚存的殘本輯錄。C. Müller 與 T. Müller 合輯之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第五卷 FHG 5 vols., Paris, 1841—1970; F. Jacoby, *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第五卷 *FGH* (Berlin, Leiden, 1923—) 後者有極好的注釋。下取代 Müller 之書的地位，可是尚未出版。羅馬史家方面可看·H. Peter, *Historicorum Romanorum reliquiae I* (ed. 2, 1914) II (1906)。

古代史家著作之版本：除 Teubner 與 Oxford 叢書 (BT, OCT) 之標準版本之外，大部分作品還有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CL) 本可用。原文之外附有英文翻譯。相同地有些史家的作品收在 the Collection Budé (CB) 本中，附法文翻譯。史家個別之參考書目見下文。

古代史與古代史學：R. Laqueur 之 *綜論* 見 *N/A* 7 (1931), 489ff; K. H. Guterbock "Die historische Tradition und ihre literarische Gestaltung bei Babyloniern und Hethitern" *ZA N.F.* 8 (1934); W. von Soden "Leistung und Grenze sumerischer und babylonischer Wissenschaft", *WG* 2 (1936), 411ff, 451。

西方古代史學：A. Goetze, *Kulturgeschichte des Alten Orients, Kleinasien*, in Müller (ed. 2, 1957), 174—175; A. Kammenhuber, *Saeculum* 9 (1958), 136—155。

古代史之民族：E. Meyer,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II*, 2 (ed. 2, 1931), 198ff; G. Holscher, "Die Anfänge der hebräi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SHA W* 1941/42, no. 3。

羅多德史之來源 (Chaldaean chronicles) · D. Wiseman, *Chronicles of Chaldaean Kings* (626—556 B.C.)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6); 又見 H. Bengtson, *Historia* 6 (1957), 499—502 通論參 B. Landsberger 與 T. Bauer 合著之 *ZA* 37 (1927), 61ff; W. von Soden 之 *WG* 2 (1936), 455, 屬於同一類的還有新羅多德史多卷與 *Diadochi Chronicles*, 敘述亞歷山大大帝死後已比倫尼亞一帶的戰爭 · 又參 · S. Smith, *Babylonian Historical Texts* (London 1924), 140ff, 154ff, 又見 W. Otto 之 *SBAW* 1925, Schlussheft, p. 1.

荷馬史與荷馬問題 (Hilad) · 有關荷馬問題之歷史可參 · M. Nilsson, *Homer and Mycenae* (London 1933) W. Schadewaldt 曾持共有關係說與其社會關係說解釋荷馬史 “Homer und sein Jahrhundert” *Das Neue Bild der Antike* (1942), 51ff. 又參 Von Homers Welt und Work (ed. 2, Stuttgart 1951) · H. Bengtson 之 *Griechische Geschichte* (ed. 3, 1965) 61, note 2 中有一較新之參考書目 · H. Lorimer, *Homer and the Monuments* (London 1950) 一書已受重視 · 又參或 A. Lesky, *Die Homerforschung in der Gegenwart* (Vienna 1952) 最近之參考書 A. Heubeck, *Gymnasium* 71 (1963), 43—72。

希臘史學之源起 · 參 J. Bury,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London 1907, 1958 重印) · F. Jacoby 之 *Klio* 9 (1909), 80ff; 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 *Greek Historical Writing*, G. Murray 英譯 (Oxford, 1908) · 一本英國刻本但有其後的增補 · E. Howald 之 *Vom Geist antiker Geschichtsschreibung* (Munich 1944), 荷馬 Herodotus, Thucydides 與 Polybius。

希臘史學之源起 · W. Schadewaldt 之 *Die Antike* 10 (1934), 144ff; L. Pearson, *Early Ionian Historians* (Oxford 1939) · 關於 *Isotopon* 的觀念參看 B. Snell, “Die Ausdrücke für den Begriff des Wissens in der vor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Phil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29 (1924), 59ff, 又參 *Festschrift für K. Reinhardt* (1952) · Hecataeus 作品殘本收於 *FGH* 1, Hecataeus 的理性主義見 A. Momigliano 之 *Atene e Roma*, n.s. 12 (1931), 133ff, 又見 G. De Sanctis, *Studi di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greca* (1951), 3ff.

希臘多德 · 有 Hude 的 *OC* 71 (1909) 本以及 P. Legrand 本 (Paris, 1932—1955); 注釋本有 H. Stein (1856 初版, 此後經常再版) · W. Howald

J. Wells (ed. 2, Oxford 1928) · 較新的版本 · 注釋及翻譯介紹見 G. Grosskinsky 之 *Gnomon* (1952), 265ff. 此注釋特別的版本有 · A. Sayce 之 *Herodotus* 1-III (London 1883, 已遺失) · R. Maean 的 *Herodotus* IV—VI, VII—IX, (2 vols., 1895—1908, 基本註釋) · Wiedmann 之 *Herodotus* 2. Buch (on Egypt) (Leipzig 1890), 又參 W. Spiegelberg, *Die Glaubwürdigkeit von Herodots Bericht über Ägypten im Lichte der ägyptischen Denkmäler* (Orient und Antike 3, Heidelberg 1926); J. Vogt, “Herodot in Ägypten” *Festschrift W. Schmid* (Tübingen Beiträge 5, 1929) 95ff; H. de Meulenaere, *Herodotus over de 26 dynastie* (II, 147—III, 15), in *Flemish* (Louvain 1951); 又參或 E. Powell, *A Lexicon to Herodotus* (Cambridge, 1938)。

F. Jacoby 之 *RE* Supp. II (1913), 205ff 中文字雖然是一個希臘多德對平與著作的基本參考 · 又可參看 · W. Aly, *Volksmärchen, Sage und Novelle bei Herodot und seinen Zeitgenossen* (Göttingen 1921); J. Wells, *Studies in Herodotus* (Oxford 1923), 又參或最近之參考書 · F. Focke, *Herodot als Historiker* (Tübingen Beiträge 1, 1927); K. von Fritz, “Herodotus and the Growth of Greek Historiography” *TAPA* 67 (1936), 315ff; M. Pohlenz, “Herodot der erste Geschichtsschreiber des Abendlandes,” *Neue Wege zur Antike* 2 (1937), nos. 7—8; F. Eggemann, “Das Geschichtswerk des Herodot,” *N/A* (1938), 191ff, 239ff (有新的解釋 · 尤其是關於希臘多德作品之討論) · E. Powell, *The History of Herodotus* (Cambridge 1939); J. Myres, *Herodotus, Father of History* (Oxford 1935); W. Margherita Herodot: *Eine Auswahl aus der neueren Forschung* (Munich 1962) 是一本有用的書。

散文作家 (logographers) · 修西底地斯用這個名詞的時候是指散文作家 · 包括希臘多德在內 · 現代的學者用這個詞 · 如 F. Creuzer 在 *Die historische Kunst der Griechen* (1803) 一書中所用 · 是指希臘多德以前較早的希臘歷史家 · 雖然這種用法和修西底地斯正相抵觸 · 參看 · Bux 之 *RE* XIII, 1021ff 中所論 · 這些 logographers 的作品殘篇見 *FGH* 卷 I 及卷 II · The Attidographers 的殘本見 *FGH* 卷 III · 323aff; 又參看 Jacoby 的基本性書籍 · *Attis: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Ancient Athens* (Oxford 1949)。

修西底地斯 (Thucydides) · 有 C. Hude 之 (Leipzig 1898—1908,

1908—1913); 又 C. Hude 本為蘇本之新版本。有 O. Luschkat 本，但只收 Thucydides 卷 1，卷 2 (ed. 2, Leipzig 1960)。又 H. Jones 譯 E. Powell 註釋 OCT 本 (1942); J. Classen 譯 Steup 本 (1942) (eds. 3—5, Berlin, 1900—1922); 又 A. Gomme 本 (1939) (3 vols., Oxford 1945—1956)。又 Meyer 本 (1942)。關於 Thucydides 之研究，參見 Meyer, *Forschungen zur Alten Geschichte II* (Halle, 1899), 269ff.; A. Gomme, *Essays in Greek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xford 1937), 156ff.; H. Berve, *Thukydides* (Frankfurt/Main, 1938); G. De Sanctis, *Storia dei Greci II* (1939), 409ff.; F. Eggermann, "Die Geschichtsbetrachtung des Thukydides," *Das Neue Bild der Antike I* (1942), 272ff. (272 頁以下有中譯本，參見 4) ; G. Grundy, *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 (2 vols., Oxford 1948); F. Adcock, *Thucydides and His History* (London, 1963)。最近非希臘學者所著之研究，參見 H. Strasburger 著 "Die Entdeckung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durch Thukydides," *Saeculum* 5 (1954), 395ff.; 又 "Thukydides und die politische Selbstdarstellung der Athener," *Hermes* 86 (1958), 17ff. (尤其是關於修西底地斯書中演說)。

一個多世紀以前，F. Ullrich 曾提出修西底地斯最初著作計劃的問題。他認為修西底地斯原來以計算高巴達米亞戰爭 (the Archidamian War)，後來才將之與波羅奔尼撒戰爭連成一氣。這個假說的支持者最強的證據是卷四·二十六章第一節所謂的第十二個序言。參見 F. Ullrich, *Beiträge zur Erklärung des Thukydides* (Hamburg 1846); 又 E. Schwartz, *Das Geschichtswerk des Thukydides* (Bonn 1919—1929), W. Schadewaldt, *Die 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Thukydides* (Berlin 1929), J. de Romilly, *Thucydides et l'imperialisme athenien: La pensée de l'historien et la genèse de l'oeuvre* (Paris 1947—1951) 以及都普爾的圖解說。又對古學者認為修西底地斯從一開始即計算整個戰爭，此一派見 E. Meyer, 和 H. Patzer, *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Thukydides und die thukydideische Frage* (Berlin 1937); J. Finley, Jr., "The Unity of Thucydides' History," *Athenian Studies Presented to W.S. Ferguson* (HSCP, supp. 1, Cambridge, Mass. 1940), 225ff. 以及他的 *Thucydides* (Cambridge, Mass. 1942) 1 節。

關於修西底地斯書中演說的研究，參見 F. Eggermann 本，*DLZ* (1937) 1471ff., 1503ff.; 又 *Das neue Bild der Antike I* (1942), 285ff.; 又 O. Luschkat, *Die Feldherrnreden im Geschichtswerk des Thukydides* (Philologus, supp. 34, no. 2, Leipzig (1942); F. Adcock, "Thucydides in Book I," *JHS*, 71 (1951), 21ff. (有中譯本，參見 4) 。關於其書中演說之研究，參見 C. Meyer, *Die Urkunden im Geschichtswerk des Thukydides* (Zetemata 10, Munich 1955)。

關於修西底地斯 (Xenophon) 本 Marchant OCT 本 (1900ff.), C. Hude 本 (1930ff.)，又 J. Hatzfeld 本 *Helleniques* (2 vols., Paris 1949, 1948)，並參見 Meyer 本，參見 E. Schwartz, *RhM* 44 (1889) 104ff., 169ff.; A. Banderet, *Untersuchungen zu Xenophons Hellenika* (Diss. Berlin 1919); H. Breitenbach, *Historiographische Anschauungsformen Xenophons* (Diss. Basel, Freiburg im Switzerland 1950); E. Delebecque, *Essai sur la vie de Xenophon* (Paris 1957) 以及 Xenophon 本 Anabasis 註釋本 (參見 4) 。

關於修西底地斯 (Theopompus of Chios) 本，參見 F. G. H. 115; 又 Meyer 本，參見 H. Berve, *Das Alexanderreich auf prosopographischer Grundlage II* (1926), no. 365; R. Laqueur, *REVA*, 2176ff.

關於修西底地斯 (Cratippus) 本，參見 F. G. H. 64; 又 Oxyrhynchus 本，參見 *Handbuch der Hellenica I* 卷 66; 又 Papii della Societa Italiana 13 (1949), no. 1304. V. Bartoletti 本 *Hellenica Oxyrhynchia* (Leipzig 1959) 並參見 Meyer 本，參見 H. Bloch 本 *Athenian Studies Presented to W.S. Ferguson* (HSCP, supp. 1, Cambridge, Mass. 1940) 中 卷 4 - 303ff.

關於修西底地斯 (Ptolemy) 本，參見 F. G. H. 138; 又 Meyer 本，參見 H. Strasburger, *Ptolemaios und Alexander* (Leipzig 1934); E. Kornemann, *Die Alexander Geschichte des Königs Ptolemaios I von Ägypten* (Leipzig 1935) 並參見 Meyer 本，參見 Meyer 本，參見 Meyer 本，參見 Meyer 本。

關於修西底地斯 (Callisthenes) 本，參見 W. Kroll 本，參見 *Wurzburger Studien zur Altertumswissenschaft* 8, 1936) 以及 Meyer 本，參見 Meyer 本，參見 Meyer 本，參見 Meyer 本。又 Ausfeld, *Der griechische Alexanderroman* (Leipzig 1907); F.

Pfister "Studien zum Alexanderroman," *Würzburger Jahrbuch für Altertumswissenschaft* 1(1946), 29ff. 以及他其他許多著作。R. Merkelbach, *Die Quellen des griechischen Alexanderromans* (Zetemata 9, Munich 1954)。

亞歷山大帝史之入種誌學 (ethnographers) Nearchus 的殘卷見 *FGH* 133; 又見 W. Berve 或 W. Capelle 於 *RE* XVI, 2132ff. 亦見 O. Onesicritus 於 *FGH* 134; 又 H. Strasburger, *RE* XVIII, 1, 460ff. 又見 T. Brown 於 Onesicritus (Berkeley, 1949)。Megasthenes 的殘卷見 Schwanbeck 輯錄 (1846); 參 T. Brown 又見 *A/P* 76 (1955), 18—33. 又見 *Phoenix* 11(1957), 12ff.

蘇·拉赫勒斯 (Ephorus of Cyme) 於 *FGH* 70。他的書有計畫，從 "Heracids 的繼承" (亦即希臘人對 Dorian 的入侵) 開始到公元前四〇年。卷三十一是由 Ephorus 的兒子 Demophilus 所加。基本研究有 E. Schwartz 於 *RE* VI(1907), 1ff 中討論。關於成書時代，參 B. Niese 又見 *Hermes* 44(1909), 170ff. 也談到 Alexander 時代的 Schwartz 於 *FGH* 70 又見 G. Barber, *The Hellenistic Ephorus* (Cambridge 1935)。

提邁奧斯 (Timaeus of Tauromenium) 殘卷見 *FGH* 566。有關研究見 J. Beloch, *Fleckeisens Jahrbuch für Philologie* (1881), 697ff; E. Schwarz, *Gesammelte Schriften* II(1956), 175ff; R. Laqueur, *RE* VIA, 1076ff; J. Geffcken, *Timaios's Geographie des Westens* (Phil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13, Berlin 1892); K. Stroheker, "Timaios und Philistos," in *Satura: Festschrift O. Weinreich* (1952), 139ff; G. De Sanctis 輯錄。Ricerche sulla storiografia siceliota (Palermo 1958); T. Brown, *Timaeus of Tauromenium* (Berkeley 1958)。

波利比烏斯 (Polybius) 現存的有卷一至卷五，從公元前264—216年之事以及卷六至卷四十的若干殘文。版本有 Th. Büttner-Wobst (1889ff) 一本重要的註釋本 F. Walbank 的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 I(Oxford 1957)，包括卷一至卷六。A. Mauser 輯錄 *A Polybius-Lexikon* 四冊，卷七至卷十已出版 (Berlin 1956—1961)。重要的論著有 R. von Scala, *Die Studien des Polybios* I(1890)，又見 *Zeitschrift für Klassische Philologie* 1902; C. Wunderer, *Polybios: Lebens- und Weltanschauung aus dem 2. Vorhistorischen Auffassung des Polybios* (Leipzig 1928);

K. Lorenz,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swerk des Polybios* (Stuttgart 1931)，又見其後到卷一與卷三之研究。R. Laqueur, *Polybios* (Leipzig 1913) 一書所說之理論——在現存的 Polybios 中，已找到五種前後不同的版本——是鑲拼角片和難於服人的。以他的書來評 E. Meyer 的 *Kleine Schriften* II (1924), 334ff; K. Lorenz, 註釋卷 69ff; 或見 M. Gelzer, "Die hellenistische *ποκατακρυψις* im 2. Buche des Polybios," *Hermes* 70(1940), 27ff; "Die Achaica im Geschichtswerk des Polybios," *SB Berlin* 1940, no. 2, "Über die Arbeitsweise des Polybios," *SHA W* 1956, no. 3; 或見 Gelzer 於 *Kleine Schriften* (3 vols., Wiesbaden 1962—1963) 或見 H. Erbse 於 "Zur Entstehung des polybianischen Geschichtswerkes" *RhM* 94(1951), 157ff. (又見 *Philologus* 101(1957), 269ff.) 一文所發表極端線性的看法。亦見 Laqueur 極端支離性的假設同樣不可取。雙方必須折衷調合——這方面的短論見 A. Rosenberg 的 *Einleitung und Quellenkunde zur römischen Geschichte* (1921), 188ff, 又見 Glover 於 *CAH* 卷 4 (1930) 1ff 中討論。一書有價值的論述是 K. Ziegler 的長文 "Polybios," *RE* XXII(1952), 1440ff. 又見 K. von Fritz 的 *The Theory of the Mixed Constitution in Antiquit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Polybios' Political Ideas* (N.Y. 1954)。

塞西奧斯 (Poseidonius of Apamea) 殘卷見 *FGH* 87。其人生平及說教研究見 K. Reinhardt, *Poseidonios* (Munich 1921), *Kosmos und Sympathie* (Munich 1926) 又見 "Poseidonios," *RE* XXII(1953); J. Stroux 輯 E. Schwartz 著 *Charakterköpfe aus der Antike*, (Leipzig 1943), 89ff 討論書頁 288—289 年近來研究均參看書目。

蒂奧德羅斯 (Diodorus Siculus) 他四十卷的 *Universal History* 或有關古代近東及神話時代的卷一至卷五與記載西元前四〇〇至三〇〇年間的卷十一至卷廿尚存。Vogel 與 Fischer 合編本不全 (Stuttgart 1964 年重印) 亦有關討論見 E. Schwartz *RE* V, 663ff; W. Schmid,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Literatur* II.2 (ed. 6, 1920), 403ff; A. von Meiss,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Arbeitsweise Diodors," *RhM* 61(1906), 244ff. 關於他所用資料來源參看 C. Volquardsen, *Untersuchung über die Quellen der griechischen und sizil Geschichte bei Diodor* 11—15 (Kiel, 1868); G. De Sanctis,

Ricerche sulla storiografia siceliota (Palermo 1958), 78ff, R. Laqueur 又: *Hermes* 86(1958): 256ff, J. Palm, Über Sprache und Stil des Diodoros von Sizilien (Lund 1955)。

羅馬史學史綱要: 參看 Schanz-Hosius 及 Leo 的文獻史, 又及 F. Klingner 的著作: *Die Antike* 13(1937), 1ff。

羅史綱要: Rosenberg 著 Einkleitung und Quellen Kunde zur römischen Geschichte (1921), 113ff, 有結論指中重要的問題。又見 J. Vogt, "Römische Geschichte" 又及 Gerke-Norden III. 2 (ed. 3, 1933), 45ff, 我們須要本基於嚴格歷史分析的新的綜合性的書。Servius 的 ad Aeneid 1-373 又及 Cicero 的 De oratore 2.12.52 曾提到儒侶年表。

皮克托 (Q. Fabius Pictor) .. 在前述 Rosenberg 的書中頁 111 曾討論到皮克托的著作。他認為皮克托的書是 T. Quinctius Flaminus 希臘政策下的工具: 參看 M. Gelzer, "Römische Politik bei Fabius Pictor" *Hermes* 69(1934), 46ff, F. Bömer 曾有一部新大的討論: *SO* 29(1925), 34ff, 其說被 Gelzer 反對: 又 *Hermes* 82 (1954), 342ff。—— 瑪尼索 (Manetho) 著作殘卷有 W. Waddall (1940) 輯錄之 LCL 叢書本, 又收入 FGH 609。有關研究見 R. Laqueur 之 *RE* XIV, 1060ff 中又—— 貝羅羅斯 (Berosus) 著作研究見 P. Schnabel, Berosus und die babylonisch-hellenistische Literatur (1923); C. Lehmann-Haupt, *Klio* 22(1929), 125ff, 又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I, s.v.

牛圖 (M. Porcius Cato) .. *Origines* 之殘卷收入 H. Peter 編輯之 *Historicorum Romanorum reliquiae* I (ed. 2), 55ff, 有關研究見 F. Klingner, "Cato Censorius und die Krisis des römischen Volkes", *Die Antike* 10 (1934), 239ff, 又 *Römische Geisteswelt* (ed. 4, 1961), 36ff。

羅馬歷史材料專著: L. Coelius Antipater 之殘卷見 H. Peter 輯本 158ff, 又參 Rosenberg 第 167ff, 又及 W. Hoffmann, Livius und der zweite Punische Krieg (*Hermes*, Einzelsch. 8, Berlin 1942)。

希臘史綱要 (C. Sallustius Crispus) .. 其短篇著作在 W. Ahlberg 本 (Leipzig 1913); A. Kurfess 又 (ed. 3, 1957), 其 *the Histories* 殘卷有 B. Maurenbrecher (Leipzig 1891—1893), 其全集有 A. Ernout 本 (Paris 1947)。希臘史綱要: K. Baehof, Die Komposition der Historien Sallusts (Diss. Munich 1935); 較早的研究有 E. Schwartz

"Die Berichte über die catilinarische Verschwörung," *Hermes* 32(1897), 554ff, 又 *Texte zur Gesamten Schriften* II (1956), 275ff; O. Seel, Von den Briefen ad Caesarem zur Coniuratio Catilinae (Diss. Erlangen 1930); F. Egermann, "Die Proömien zu den Werken des Sallust" *SAW* 214(1932), no. 3; W. Schur, Sallust als Historiker (Stuttgart 1934), 又 *Klio* 29(1936), 60ff 文中曾有所指。J. Vogt, Cicero und Sallust über die catilinarische Verschwörung. (Frankfurt/Main 1938); E. Howald 著 Vom Geist antiker Geschichtsschreibung (Munich 1944), 140ff 曾有所指。又 *Sallust* 的 the Jugurthine War, 或見 K. Büchner 著 Der Aufbau von Sallusts Bellum Jugurthinum (*Hermes*, Einzelschrift 9, 1953) 又及 W. Steidle 著 Sallusts historische Monographien (Historia, Einzelschrift 3, 1958)。解釋其的著作有 K. Büchner 著 Sallust (Heidelberg 1960); R. Syme 著 Sallust (Berkeley 1964) 或一本重要的著作。

李維 (Livy) .. 有 W. Weissenborn 輯 H. Müller 合編之注釋本 (1962) 重印。Berlin) .. 原文有 Conway 與 Walters 的輯本 OCT 叢書本 (1914—1935); J. Bayet 的輯本 CB 叢書本 (1940—)。李維的書現存的有卷一至卷十 (—293B.C.)。卷十一至四十五 (219—167B.C.); 簡言之, 只剩下原書的四分之一。佚失的部分有一些已從「歷史摘錄」Periochae 中又及 Julius Obsequens 所輯從西元前一九〇年開始之佚事集中重建出來。此外, 最近還發現了卷三十七至五十五的摘要: 參看 E. Kornemann Die neue Livius-Epitome (*Klio*, Beiheft; 1904) 又及 F. Münzer 又: *Klio* 5(1905), 135ff。

關於李維的史料來源: 一本基本的著作是 H. Nissen 著 Krit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Quellen der 4. und 5. Dekade des Livius (Berlin 1863); 又參 A. Klotz, Livius und seine Vorgänger (Berlin 1940—41), 曾輯或 M. Gelzer 又: *Gnomon* (1942), 220ff, 又及 Gelzer 的文章 "Livius" *RE* XIII(1927), 816ff。

關於李維做為一個藝術家及學者: 參 E. Burck 著 Die Erzählungskunst des T. Livius (Problemata II, Berlin 1934), 又及其 "Livius als augusteischer Historiker" *W/G* 1(1935), 446ff。

(原載 "大陸雜誌" 台) 一九八四年 六九卷四期 三一—四四頁)

古羅馬帝權的真象

(二)

理想——權威

「業績錄」在安卡拉(土耳其)的奧古斯丁與羅馬女神神殿的「業績錄」。拉丁語版的一部分。



「從此以後(西元前二十七年一月十三日以後)，雖然在權威方面勝過萬人；但在權限上，却與當時其他的政務官無甚差別……」(「業績錄」三四)。

奧古斯丁勝過其他元老院議員的地方，在於權威。這是他自己在「業績錄」中所說的話。

把「業績錄」上的話譯為權威(奧庫特里達斯)，還有另一段有趣的故事。這一段文章，由希臘語的翻譯直接承傳下來，拉丁語中並無這樣的詞彙，摩姆森把這個詞譯成拉丁語的「聲望」。文獻學家有一段時期，

相當盲目的追隨偉大摩姆森的「聲望」。後來在新碑文中發現，所以在二十世紀初，才擺脫摩姆森的「聲望」，譯成「權威」。

所謂的權威究竟指的是什麼？為什麼奧古斯丁會在這裡提出來呢？

首先想起的，權威是一種屬於羅馬的概念，在羅馬以外的世界看不到這種情形。

這也不是建立在某一完整制度上的概念，所以即使奧古斯丁，也無法在法律上，找到他的權力及統治的基礎。只可以說，他在一國之中，擁有比任何人都大的特權，或者擁有道德性的權威。其次不可忘記，這是根據共和制度而來的做法。我們只要記住，元老院在決議的原文上記載的是奧庫特里達斯(權威)，也就是助言者(奧庫特爾)，助言(奧庫特里達斯，也就是合法的助言)。換句話說，是元老院回答諮詢時的助言機關。對於向元老院諮詢的官員所給予的助言，就是奧庫特里達斯。